

中医药：中国文化的暗线及其显影

张超中

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

摘要：中医药的定性与定位问题是决定其理论建构与阐释方式的基础问题。在科学方法不足以充分阐释中医药的情况下，需要从中医药理论自身建构的历史过程出发，从中国上古文化“为己之学”的原意中寻找其作为学问的本性。以此为基点，中医药不仅成为中国文化的母体和源头活水，而且由“暗”转“明”，成为中国文化的新主体和新的阐释方式，并开拓出经由中医药而“通古今之变”，阐释未来和开创未来的新视域。

关键词：中医药；中国文化；为己之学；古今之变；阐释学

中医药的定性与定位问题一直是中医哲学研究的核心问题。百年以来，无论中医药的从业人员愿意还是不愿意，中医药在国家的学科分类体系中皆被归类于自然科学，目前的中医学、中药学和中西医结合学仍然处于这种格局之中。随着中医哲学和中医药文化等有关研究成果的不断积累，中医药的人文属性逐渐彰显并变得不可忽视。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健康中国 2030”规划纲要》指出要“充分发挥中医药独特优势”，习近平总书记指示中医药工作“要遵循中医药发展规律，传承精华，守正创新”，这都说明对中医药的定性和定位问题直接决定了顶层设计及其精神的贯彻落实。从现实情况来看，对中医药性质的认识不清晰和落实中央精神不到位的现象普遍存在。面对类似的这种现象，中国哲学史学会中医哲学专业委员会名誉会长刘长林教授曾经自担责任，认为这是自己的研究不到所致。为此他与孙关龙、宋振海等同仁一起倡导“自然国学”研究，力求推进全社会对中医药性质的全面理解和把握。2016年12月2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法》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发布，自2017年7月1日起施行，该法第二条指出：“本法所称中医药，是包括汉族和少数民族医药在内的我国各民族医药的统称，是反映中华民族对生命、健康和疾病的认识，具有悠久历史传

统和独特理论及技术方法的医药学体系。”^①应当重视的是，这里把“中华民族”定义为“中医药”的创造主体，体现出时代发展对中医药的定性已经发生了新的变化，旧有的把中医药归类于“自然科学”的格局也应该随之而变，即应当基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历史融合过程，并在中国文化“千年之变”的基础上解释“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以期通过对建构新的全球健康文明的阐释和实践，有助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此应当首先力求“通古今之变”，从中发现中医药的历史新定位。

一、中医药的文化主体性及其阐释体系

《汉书·艺文志·方技略》对当时称为“方技”的中医有总评，感叹其“技术晦昧”：

方技者，皆生生之具，王官之一守也。太古有岐伯、俞拊，中世有扁鹊、秦和，盖论病以及国，原诊以知政。汉兴有仓公。今其技术晦昧，故论其书，以序方技为四种。^②

此处所谓的“晦昧”，不仅是指狭义性的“技术”，也是指“上医治国”传统的暗昧不彰，即随着医官地位的下降，“论病以及国，原诊以知政”的功能也逐渐丧失。司马迁作《史记·扁鹊仓公列传》，从中可窥春秋战国以来医生社会地位之一斑。汉代以降，这种情势并无多大改变，清代徐灵胎在论医生地位时，也是感叹万千，认为社会不重视医道，其结果就是生灵罹祸，文化不振。

近代以来，伴随着“西学东渐”而来的则是中医药的自主发展问题一直未明，并隐藏在国家兴亡和民族独立的浩浩荡荡之势中，也就是说，与传统社会中医药的文化弱势相比，近现代社会的中医药未能彰显自己的文化主体性。与这种状态相适应，在中医药知识体系的现代建构过程中，“自主”也被“科学”“哲学”“现代医学”等置换和遮蔽，致使中医药陷入了一种“不由自主”的被动阐释意识和语境。日积月累，渐愈百年，潜移默化，习以为常，如今要“颠覆”这种“习以为常”的认知方式，需要学术界从基础理论问题的视域出发，深入研究中医药的自身发展规律，用新的“解蔽”理论和方式重新阐释中医药的文化主体性。从中

^① <http://www.natcm.gov.cn/fajiansi/zhengcewenjian/2018-03-24/2249.html>

^② [汉]班固：《汉书》第169页，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版《二十五史》，1986年12月。

西哲学会通的视域来看,“阐释”就是“解蔽”,“阐释学”的精神与方法对解释和阐发中医基础理论的内核具有一定的启发性,即二者皆注重“精神”的规律及其实践,但是这种助力只是外缘,根本的阐释只能奠基于中医药的“自明性”;^①而从历史发展的逻辑来看,上述的“自明性”所规定的实际上是新时代对西学“遮蔽”的“解蔽”,也就是说,原来的“以西释中”模式已经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其所遗留的未能解决的问题只能依靠“中学”的自力才能完成。这时一个因应外来文化挑战的现实问题,其情其景,真可谓唐宋之际“古文运动”的再现。

刘宁指出,与对韩愈文学成就的肯定相比,现代哲学界和思想界显现忽视了韩愈对中国思想发展的贡献。^②作为古文运动的倡导者,韩愈实际上创造了一种新的“解蔽”方式,即在追溯中国文化“道统”的基础上,通过“文以载道”的阐释方式,促进了中国原创思想“自主意识”的觉醒,实现了佛教中国化背景下儒学的复兴,为开创中华文明儒、道、释三教合一的新格局作出了历史性贡献。我们看到,同为“唐宋八大家”之一的苏东坡对韩愈推崇备至,赞其“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他的评价是在“通古今之变”的基础上做出的,认为韩愈借助于新的教化方式,改变了中国上古之道被普遍遮蔽的局面。推古验今,所以不惑。韩愈以“古文”为解蔽方式,通过“文以载道”的实践宣传普及了中国文化的时代精神。那么在推进西方文明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寻找和创造“与时俱进”的新的解蔽方式也势在必然。

从历史来看,新的解蔽方式皆是与“综合创新”的时代任务相适应的思想方式,且各有其主。《庄子·天下》评判百家之学,其实是以“古之博大真人”作为解蔽标准的,这既是对“且有真人而后有真知”(《庄子·大宗师》)的具体诠释,也是对知识本身的反思。“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已;已而为知者,殆而已矣。”(《庄子·养生主》)如果认识不到知识是主客体的统一,舍人舍身而逐知,那么求知行为所带来的只能是不可持续的后果,这对学派及其创始人来说皆是悲剧。“悲夫,百家往而不反,必不合矣!后世之学者,不幸不见天地之纯,古人之大体,道术将为天下裂。”“惜乎!惠施之才,骀荡而不得,逐万物而不反,是穷响以声,形与影竞走。悲夫!”(《庄子·天下》)后来的《荀

^① 张超中,中医学的自明性问题——兼评《中医学的逻辑哲学:中医原创思维与中西医逻辑比较》[J],江凤艳、陈玉梅主编,中医药历史与文化(第四辑)[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3.

^② 刘宁,同道中国:韩愈古文的思想世界[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3.

子·解蔽》虽然对庄子提出了批评，认为其“蔽于天而不知人”，其实这是一种“圣人”对“真人”的价值判断，体现出儒道两家精神价值追求的差异。而在这差异之外，荀子认为，只有具备“壹虚而静”“大清明”的素养才能胜任“解蔽”之繁，这与《庄子》的“真人说”则有相通之处。汉代的司马谈《论六家要旨》亦然，他主张归本于“道家”，原因也是“道家使人精神专一”，“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既传承了“真人”传统，又能有助于在社会的竞争中胜出。

从上可见，中国文化具有一以贯之的解蔽传统，即在“人能弘道”的前提下实现“文以载道”，确定了“人”对方法的先在性。这是一种与现代还原性的科学方法对人的遮蔽完全不同的方法传统，实际上整体性方法的精髓也体现在这里。2003年夏天，我从《老子》关于“人”（官长、侯王）的主宰性的论述中看到了其关键作用，解决了“整体的生成机制”这一整体论方法的核心问题，其要义就在于“人”是整体论的基点，没有人参与的整体就不是真正的整体。从整体论出发，原本的科学问题则一变而成为文化问题，科学的转型发展问题也就必然与文化和文明的转型发展联系起来，即只有“迷途知返”，在方法中加入“人”，才能促进解决科学技术和社会发展的根本问题。与此同时，这一方法论上的发现促进了对中医药的再发现，亦即中医药在理论与实践中对“人”的强调和遵循，使得其成为整体论的最佳典范。从此出发，董光璧先生认为，未来的科学与文明发展应当以中医药作为评判的“镜鉴”标准。这就是说，只有亲近中医药，才能获得对于未来的“真知”。《庄子》认为“有真人然后有真知”，与“百家”的“往而不反”不同，“真人”“真知”的表现就在于“知”“反”，亦即《老子》所说的“反者道之动”。

由此来看中医药自主发展的战略问题，近现代以来其“自主性”的迷失恰恰在于“科学”对“文化”的遮蔽，中医药自主知识体系建设的关键则在于去掉“遮蔽”，开创文化引领未来的基础路径。我们看到，以科学作为标准，中医药曾经一度被认为是“无理可通”，“阴阳五行”更是被称作“迷信的大本营”。在那种“无处可逃”的时代压力下，中医药研究者对各个领域的新理论都情有独钟，以便阐释中医药的合理性，为其实践应用和传承发展扫清障碍，其思想行为并无不当之处。只是“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与中医药全然合辙的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哲学理论至今尚未发现。尽管没有发现有另一个“他者”，

但借助于“他者”却发现了自身，实现了对中医药自身的再发现。我认为，对中医药的再发现既是我国哲学社会科学领域取得的基础性成果，也是为“天下”解蔽的新方法。如今中国文化的综合创新更是需要振弊起新，为“天下”解蔽。这不仅将会直接促进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建设，也将深刻影响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形成。

二、中医药的文化定性及其定位

至今为止，与我国对中医药科研的投入和支持力度相比，中医药文化的研究与普及显得远远不够。由于缺少文化的强力支撑，虽然在对中医药的发展战略研究和中医药事业的国情调研过程中提出了系统性的解决对策，但我国中医药事业发展的整体气象尚不够“中医药”。与此相联系，中国哲学史学会中医哲学专业委员会从2006年筹备和成立以来，在长达二十多年的研究和发展过程中，在总体上一致致力于改变原来的被动阐释方式，以期发挥中医药理论方法自身的原创潜力。这是一项时代性的任务，即在中医药事实上已经成为中国文化的新主体，并正在深刻改变原来儒道释为主体的中国文化基本格局的情势下，如何让社会大众意识到并促进其实现“文化自觉”，这是理论工作者不可回避且要必须完成的时代课题。也就是说，揭示中医药的中国文化新主体性质，使其历史性的由“暗”转“明”，这也是全球化时代下中国文化基本格局发生变化的必然要求。

由于缺乏大的历史视野和历史意识淡漠，“阐释学”的中国化过程显得比较曲折，学术界多限于中西哲学及其思想学理性的比较研究，而对中国文化的“千年之变”认识不足，致使所谓的“阐释”难以阐释中国文化的新精神。出现这种情况的基本原因，就是没有建立化被动为主动的阐释体系。从理论上讲，应当敢于承认中医药理论的“合理性和卓越性”^①，使其成为引领时代发展的“明灯”。基于上述认识，中医药的自主知识体系建设过程，应当是一个放弃原来被动阐释自身合理性的旧路径，建立以中医药自身为标准从而阐释新世界的历史过程。这将是一个与全球科技转型和文化文明转型相一致的艰难曲折的历史过程，也是充分发挥中医药的原创潜力和阐释能力，从而使中医药焕然一新的创造性发展过程。

^① 王树人，中国新礼乐文明构建的几个重大理论问题[N]，中国中医药报，2025年8月27日第4版。

我们看到，中医药也正在成为健康时代下全球科技的新主体，并将深刻改变人类对科技的认知。“总将新桃换旧符”，可以说中医药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最积极的促进因素，可解“百家”之蔽，可启“百家”新思，成为新科技、新文化和新文明建设的基础性资源。

“天街小雨润如酥，草色遥看近却无”，尽管中医药的发展仍然存在各式各样的问题，但是中医药发展的春天已然到来，只是春寒料峭，理论热度尚待提升。由此再看历史上关于“解蔽”的争论，由于强调了人的主体性，中医药与各家之间亦有通路。能否意会到这种通路将取决于“百家”自己，中医药的自主阐释及其自主知识体系建设只能起到促进作用。《老子》曾经告诫过，“夫代大匠斲，希有不伤其手。”由此可见，在中医药的自主阐释和自主知识体系建设的过程中，如何做到恰如其分的阐释，这将是未来面临的最大挑战。

实际上，应对上述挑战的基础方式还是认识自己，做好自己，传承发展“为己之学”。通过对中医药文化性质的进一步研究，我发现中医药学非但亦为“为己之学”，且是中国文化“为己之学”的总纲，^①这是经过多年的体认才逐步确立的基本结论。在2016年举办的中国哲学史学会中医哲学专业委员会成立十周年的报告中，中医药的定性问题成为需要进一步探讨且亟待确定的基础问题。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成圣”“成仙”“成佛”已经成为雅俗皆能认同的对儒道释文化的定位，至于如何为中医药定位，限于当时的研究水平，只是根据孙思邈“大医精诚”的精神，提出了“大医”可作为备选项，但未能成为定论。从“大医习业”的素养来看，作为一名“大医”，其主要职能还是治病救人，服务社会，对儒道释学问的学习和研究不可或缺但处于辅助地位，可谓相辅相承。与一般水平的医生相比，“大医”确实做到了“上通天文，下知地理，中通人事”，但从“内圣外王”的中国文化传统来看，“大医”属于“外王”范畴，尚未到“究竟”境界。如今把中医药看作“为己之学”，并由此解释中国文化的“古今之变”，真具有“心手相应”，触物皆通的阐释效应。

三、全球化时代下中国文化的澄明之境

^① 张超中，中医药的全球教化[M]，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25年。

从中医药入手考察中国文化的古今之变，这是一个新的阐释方式，以此“解蔽”和“去蔽”，将会逐渐开拓出来全球化时代下中国文化和创新发展的新境界。事实上，在“通古今之变”的基础上重新看待中医药的概念及其理论体系，并对其学术渊源进行研究并给出合理的解释，此非达到“真知”而后可，即应当通过中医药理论体系的创立者——“真人”的视域以“解蔽”“去蔽”。^①《老子》曰：“知人者智，自知者明。”立足当下，展望未来，通过中医药而“智”“明”兼取，“道通为一”，这是理论逻辑和历史逻辑相统一条件下中国文化综合创新的新阶段。

在中医学的元典《黄帝内经》中，“真人”是上古文化教化的原点，“神”和“神明”则是中医药理论和技术的生发点，即逻辑原点。^②“神”即“精神”，有“神”则“明”，其基础功能是对生长化收藏的主宰，有此主宰则有中医药理论体系在，无此则莫名其妙，委之他人。“明”此道理则能自作主宰，协和“百家”。与此相比，现代科学与医学对“精神”之主宰性的研究尚缺乏系统性和整体性，或者说现代科学与医学对中医药理论的这个特性做不到自洽性的阐释。因此，对中医药理论的阐释只能通过对其建构历史的研究而实现。这个研究过程实际上是一次思想考古的历程，也只有经过思想考古，才能对古真先贤有一“同情的理解”，从而把握“古今之变”的原点。

大体来看，中国文化历经了三次大的“古今之变”，即上古周秦之际“礼乐文明”向诸子百家的转变，中古佛教的传入及其中国化，近世西方文明的传入及其中国化。考察各个时期的特征，可以说第一次是纯粹的“古今之变”，其变化可用孔子所说的“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来概括，也可用出世入世来指代。那么要真正把握这次变化，需要对“为己之学”进行深入考察而不是一语带过。只是以往的考察和研究多限定在儒家和道家，虽有王冰等医家认为《黄帝内经》亦是“三坟”之学，但社会的主流文化对此并不深究，医学仍然由于是实用之学而难以占居精神文化的制高点。如今在推进西方文明中国化的过程中，中医药学得以被重新发现，由此重新审视中国文化的发展历程，竟然看到中医药一直是诸子百家论证其自身合理性的工具和标准，其意蕴与前述的董光璧先生关于中医药的未来定位相通。这是一个尚待深入开展研究并全力实施的国家重大文化工

^① 同上。

^② 张超中，黄帝内经的原创之思[M]，北京：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2013年。

程。不过这个文化现象可足以表明医学是上古文化的母体和源头,其特征就是“为己之学”。只是随着第一次的“古今之变”,“为己之学”不明,中医药也随之成为中国文化发展的暗线,其精神散入百家,可也正是这条暗线使得经史子集各具其妙而又“殊途同归”。

正如海德格尔对“存在”的追问一样,“为己之学”在中国文化的创立和发展中的地位及其意义也需要进一步澄清。我们看到,佛教传入之后,中国人的精神世界更加多样化,最后演变为儒道释三教并立的中国文化新格局,中国文化成功实现了佛教的中国化,传入之初的“礼俗之争”也以在家出家“和而不同”的方式而共存。若进一步追究,禅宗亦实为“为己之学”,此可从《六祖坛经·行由品》见其端由:

慧能即会祖意,三鼓入室,祖以袈裟遮围,不令人见,为说《金刚经》,至应无所住而生其心,慧能言下大悟一切万法,不离自性。遂启祖言:何期自性本自清净,何期自性本不生灭,何期自性本自清净,何期自性本不生灭,何期自性本自具足,何期自性本无动摇,何期自性能生万法。祖知其已悟本性,谓慧能曰:不识本心,学法无益,若识自本心,见自本性,即名大夫、天人师、佛。^①

用“神明”意会“自性”“本性”“本心”,可见“为己之学”也在佛教中国化的过程中建有不磨之功。

近世以来,特别是20世纪以来,西方文明的中国化问题一直促进中国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核心问题。2023年6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曾经提出如下论断:“经过长期努力,我们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更有条件破解‘古今中西之争’,也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更迫切需要一批熔铸古今、汇通中西的文化成果。”从上述精神来看中医药的“古今之变”,中医药成为中国文化的新主体已是历史之必然。因其固然,“为己之学”之“不争”的特性恰恰是化解“纷争”的得力“神器”。这是一个需要进一步凝聚共识并达成共识的新思路,从此出发,中医药的新征程将任重而道远。

^① [唐]释慧能著,郭朋校释,坛经校释[M],北京:中华书局,1997.